

在描摹清代林木業市場經濟的圖景中，本書尚有一些餘論可以延展深入。作者在前言中提出了「可持續性與制度」的論點，通過「可持續性市場的制度機制」來解釋長時段、廣範圍、相對穩定的木材供應動因。在各章節的處理中，作者已經較好地呈現了這條經濟鏈中大部分環節的面貌，但在結語中，作者對於這種「可持續性市場制度」在清代市場經濟扮演的角色、發揮的功能、起到的關鍵作用，論述仍有可深入空間。此外，本書考察的重點放在成材過程中的股權分割與經濟投資，較少涉及木材培育與成材前的過程，可以與「山場」研究進一步結合。儘管如此，本書對於整體史意義上構建清代林木業市場經濟的解釋框架仍具有重要影響，基本實現了作者「將市場、制度和林業之間的互動理解為一個相互交織的整體」的學術目標。

強鈺翔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史謙德(David Strand)著，《未竟之業：近代中國的言行表率》，李兆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489頁。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一人類悠長歷史上的短暫一頁，卻是近代中國政治轉型的關鍵時期。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為探索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了多重可能性，亦能夠幫助我們深化對近代中國政治乃至當下的理解。治政治史的路徑並不固定，傳統政治史注重政治制度與偉人精英的事蹟生平，而受新史學思潮影響的「新政治史」「新文化史」等門類則另辟蹊徑，側重於「自下而上」或日常生活等視角展開問題的探索。兩者的對象、路徑雖則殊異，然而同樣為背後的歷史理念所牽引，於讀者而言皆具啟發性。美國狄金森學院政治學教授史謙德(David Strand)的《未竟之業：近代中國的言行表率》(以下簡稱《未竟之業》)為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新的路徑，將以「演說」為代表的「新的政治文化」作為思考基點，視民國為「一種政治化的生活方式」而非僅是「一整套國家政治機構」(頁1—2)。該著是繼《北京的人力車夫：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後，作者在中國近代政治文化領域深耕取得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未竟之業》所關注的是由「言行表率」所構築起的政治文化網絡，巧妙地從這一視角切入近代中國歷史，並經由具體的人物個案和社會文化現象

透視時代話語（平等主義話語、共和主義話語、女性主義話語等）與智識氛圍，引導讀者重新思考歷史轉型期的共和主義議題。

除「引言」和「總結」外，全書共有6章。作者雖花大篇幅於當時重要政治人物的「演說」，但如本書副標題中的「言行表率」所示，「演說」與政治活動密切關聯，或者就政治人類學的角度而言，本就是構成後者的重要內容。第一章以「扇向宋教仁的耳光」這一頗具政治事件色彩的標題命名，實則是本書所要論及的宏大歷史敘述的開端，將民國國會內部的政治風波作為思考的起點。該章論及，當時中國革命的一大特點在於，空間上的地理流動性使政治思想同樣呈現出流動的趨勢，從而形成跨地域乃至全球性的政治網絡。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中央政治的層面失敗了」的民國，卻「成功地擴展和深化了公共生活」（頁32），為後世帶來了重要的政治遺產——一種建立在共和理想基礎之上的新的政治文化。「言辭」正是其中的一項內容，它不僅僅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交流的基本手段，同樣也成為政黨和知識份子群體自我塑造和自我呈現的重要方式，正是在公共的社會文化空間中，「言辭」發揮着引導政治行動的作用，尤其是對於前者而言，「言辭」與政治權力直接關聯。

從論述內容和編排來看，第二章和第四章應置同一敘述脈絡，即以歷史性的眼光尋微探幽，探討中國歷史上的演說傳統及其延續性。第二章試圖說明，在近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和過渡時期，共和政治這一來源於歐美而根基未穩的思潮如何立足本土，而公開的演說何以能夠成為傳達共和思想的主要政治形式。對這一問題的考察需要同時關注歷史與現實的層面，在追溯中國的演說傳統時，作者指出這一傳統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如果說在傳統的儒家社會中，演說雖受到警惕但仍是讀書人介入現實政治的形式，那麼自19世紀末起，傳統的演說與西式的演說碰撞交融，使得演說在保留某些原有文化特徵的基礎之上，轉變為一種新的政治策略。在此意義上，從帝制中國邁向「有聲的中國」無疑代表了「近代政治話語中最重要的變化」（頁100），它意味着在民族主義的激蕩之下，政治精英與民眾共同以積極的情感投身政治，從而在實踐上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構想的，建立在個體從「個」到「群」之「社會性」轉變之上的國家政治想象提供了有力支撐。第四章是從「國民的視角」展開，作者借用韋伯的政治模型分析了這一時期民國政治權力的架構，指出其特點類似多層次但結構鬆散的金字塔模型，而這一結構特徵勢必引發分別以國家組織、潮流熱情以及思想信念為基礎的三種普遍整合模式之間的相互促進和沖突。如何調適由此帶來的

激進的共和理念與國家的統一理想之間的緊張矛盾，成為共和政治的重要議題。

第三、五、六章可以視為另一重敘述單元，分別以唐群英、陸徵祥和孫中山的個案為中心，討論了這幾位代表性政治人物的「演說」活動及其政治生涯間的勾連。看似「微觀」的個人傳記史視角實際上隱含了作者的雄心，即通過隱含的「比較」方法並置這三個在歷史經驗上彼此交疊的人物，構想出一套區別於傳統式年代敘事的政治文化模型，並且藉「演說」的稜鏡更清晰地透視民國初年的共和政治。第三章「女性的共和」藉鑒了新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 Hunt)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家庭羅曼史」(family romance)的論述，通過唐群英這位激進女權主義者的政治事業，生動展現了革命時期的共和主義觀念與女性主義話語之間的內在張力，一方面，前者促進女性從私人空間進入公共領域，拓展了原有的政治空間；另一方面，革命進程中所蘊含的新舊沖突使得家庭關係複雜化，女性在公共政治空間中未能徹底擺脫傳統的掣肘。第五章的論述中心是陸徵祥，作為民國政治中高度專業化的代表性人物，陸的身上同時體現出對權威的警惕和順從，他在1912年7月18日參議院演說的「下不來臺」象徵着其政治生涯失敗的開端，也說明其「超然主義」的精神人格（同時受到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影響）無法立足於時代的政治氛圍。第六章則集中於孫中山晚年的政治活動，認為在共和主義政治亟需整合的時刻，正是通過各類「演說」活動，孫中山獲得了與民族同存的「政治神性」（頁413），他的人格在其逝世後成為民族的象徵符號。「總結」中的「領導」與「被領導」問題實際上又回到政治精英與普通人民間的關係上來，作者在這一點上突破了對於該問題的傳統看法，認為孫中山在公共意識中取得的地位與民國的制度性危機互為表裡，換言之，正是引發「有聲之革命」的「演說」，為孫中山強化共和政治提供了合法化工具。

《未竟之業》的最大特點在於方法論和視角上的多元，以及實證性基礎與敘事性的兼顧，在對各類史料觀念重新綴合的基礎之上，以「演說」切入政治文化，深入剖析了共和主義話語與民族心理、時代主潮以及社會文化結構間的糾葛，從而充分展現中國的知識群體是如何在複雜的歷史情勢下參與到「國際性的話語體系」（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135）裡的。全球史的維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本書超越傳統政治史的視域，並有助於我們突破沖擊一反應的單一模式，將特定的時代議題置於動態的全球性話語網絡之中進行思考。如美國女權主義者凱莉·查普曼·卡特的中國行中對中國女性

政治狀況的觀察包含着「誤讀」，卻反過來豐富了歐美世界女性運動的話語資源。

儘管作者將這本書歸類為「社會文化史」，但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看到更多內容，不拘泥於固定的概念框架、強調多層次的闡釋模式無疑拓寬了歷史視野，其啟發性或許也正源於此。而將共和主義這一宏大的政治論題與日常生活史層面的內容進行深入互動，亦顯示了作者所嘗試的是將微觀景象與社會文化結構進行綜合的史學實踐，這自然是對傳統政治史的有益補充。從寬泛意義上講，與時代政治緊密關聯的「言行表率」具有廣義上的「政治儀式」的特徵。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關注到儀式在20世紀早期中國人國民身分的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她看來，儀式乃是探尋近代中國「政治的多元構成」尤其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路徑，由這些儀式所創生出的各類象徵符號能夠為理解近代中國的革命歷史提供另一重敘事（沈艾娣著，呂晶等譯，《政治儀式與近代中國國民身分建構（1911—192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作者顯然受到這一研究思路的啟發，這一點可以從其多處徵引沈氏文獻並形成學術對話看到，他在論述過程中也強調政治人物言行的儀式性質及其背後所展現的複雜權力關係，如袁世凱試圖以隆重的政治儀式取代公開的演說，後者正是強權政治的「必要補充」，而孫中山則憑藉其出色的「演說」能力，將公開的講話作為「擴展自我」的共和儀式，最終使其話語成為「令人信服的中國革命核心敘事」（頁141、418）。與沈氏將國民身份視為建構之產物類似，本書作者同樣是從帶有建構主義色彩的方法論出發處理共和政治。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將歷史觀念本身對象化的同時，通過關注以情感修辭為媒介的「演說」，把反思性的政治主體抬升至歷史敘述的焦點位置。

然而，也有必要指出本書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雖然作者關注到普通民眾逐漸成長為發揮重要影響的政治力量，但其主視點仍是政治精英，對前者的處理更多顯示出抽象化和模糊化的特徵來——他也意識到了其中的「冒險」之處（澎湃新聞，〈史謙德談北京的人力車夫〉，2021年12月12日），而E. P. 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意義上的「平民文化」對時代政治話語的反應顯然不是以「贊成」或「沉默」兩種姿態能夠簡單囊括的。與此同時，在兩者之間同樣存在着不容忽視的「中層」，他們對於政治的思想情感反應也值得注意。當然，要求在一本學術著作中同時涉及以上所有內容顯然對作者「不公」，更合宜的方式是將本書視為《北京的人力車夫》一書的互補性著述，以「對着讀」的形式將後者作為參照點。此外，作者對政治精

英階層內部複雜的政治生態的揭示顯示出其敏銳的歷史洞察力，但這只是部分地解釋了共和政治的時代困境。若能就保守派如何同樣藉助演說和新興媒介來回擊共和主義話語加以着墨分析，或許能夠豐富關於傳統與現代之關係的固有觀念，亦能使本書的闡述內容更為充實。

謝魏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韓孝榮，《紅神：韋拔群與華南邊疆的農民革命》，香港：中華書局，2023年，379頁。

韋拔群與毛澤東、彭湃並稱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三大農運領袖，其領導的右江農民革命受到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韓孝榮新著《紅神：韋拔群與華南邊疆的農民革命》，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韋拔群領導的邊疆農民革命，置於更為宏大的時代背景中加以考察，旨在通過分析韋拔群在邊疆社會與國家政治的互動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更加深入地探討其領導的革命運動。全書圍繞韋拔群的兩次外出遊歷和三次組織暴動來編排章節，正文共分8章。

第一章介紹廣西東蘭縣的社會生態以及韋拔群的少年時代。東蘭是韋拔群的出生地，亦是其開展革命的核心地區。清末民初的東蘭完全符合中國人眼中的「邊疆」形象。首先，東蘭是多民族聚居地區，人口最多的是土人，也叫壯人，地位亦最高，漢人和瑤人是當地的少數民族，漢人地位高於瑤人，瑤人處於社會最底層。其次，東蘭的經濟、文化尤為落後，交通不便阻礙了商貿發展，土司長期統治導致本地形成了「重武輕文」的傳統。1894年2月6日，韋拔群出生於東蘭縣東裏村的一個富裕家庭，他既有紈袴子弟的大膽任性，也有慈善家的慷慨善良、儒家君子的愛國之心，更有農民的樸實、知識份子的精明、騎士般的豪情、壯人的勇敢，最重要的是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擅於策劃和組織，渴望領導民眾。

第二章講述1914至1921年間韋拔群的首次遊歷。1914年，韋拔群決定進行一次遠行，他去到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並得以大開眼界。1915年底，韋拔群回到東蘭，不久後又加入討袁運動之中。此後，他因反對部隊連長體罰士兵而入獄，所幸在同鄉盧濤將軍的幫助下得以釋放，還得以進入貴州講武